

转型初期首尔、上海都市小说的一种比较

——以《亡命的沼泽》、《告诉劳拉我爱她》为中心

李丹*

<目次>

- 一 序论
- 二 问题的提出
- 三 问题的形成及原由
- 四 问题透射的反思
- 五 结语

一 序论

首尔、上海都市小说创作包罗万象，色彩纷呈，对其进行平行比较，不仅有助于认识东方都市的文化形态，而且有助于都市文学的互相借鉴，尤其于步入国际都市行列未几的上海不无裨益。在首尔、上海都市小说诸多的可比性中，现代化（性）是一个突出的命题，也是都市小说最本质却最难于表现的主题之一，其困难在于都市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处于现代化之中，怎样的题材选取及主题提炼能更好地反映现代性问题。本文认为，经济转型初期新旧文化观念冲突的状态较易于考察现代化过程中的某些问题。首尔、上海都市小说¹⁾都曾注目于作为个体的人在国际化生产方式实行初期

* 李丹，文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中心副教授，淑明女子大学中文系交换教授，主要从事现代中外文学关系研究。本文为中国国家重点学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课题成果。

1) 本文选用的作品，一方面受所论主题制约，另一方面被汉译韩国小说数量所限；但只要能反映现代化初期都市生活的或一层面即可。

的生存境况，披露疲惫、压抑乃至意欲逃离都市生活的心理状态，且作家们对此做出了不同程度的探索。尽管人的生存状况是一切社会形态的根本问题，但在现代新型都市社会，传统文化与商业文化的撞击是一个突出的现象，尤其个体面临的境况尚在变动之中；在这一意义上，个体生存状态与现代化体制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东方都市小说值得探究的一个命题，且相关研究还未曾涉及这一层面。

二 问题的提出

韩国作家李炳柱的中篇小说《亡命的沼泽》²⁾的主人公“我”，是一个在商业竞争中“遭到巨大不幸”而避世的中年人，受感恩心理支配走出穴居，试图帮助困于经济问题的朋友河仁立，希望后者能得到其他朋友的帮助，然而这个打算不仅泡汤，还令“我”重温首尔人的残忍与奸佞。可重获自由的河仁立还企图重振旗鼓——再次涉足对他这个诗人来说是“沼泽”的企业经营；相比之下，“我”陷入绝境时，万念俱灰，与全家一起自杀，惟独被救生还后，再次自杀未遂，便变成一个不愿受雇于人，只对彩票之类“天上掉馅饼”的事心存侥幸，依靠所谓的妻子打发日子的人。小说情节并不复杂，但“我”的思考一定程度揭示了现代化过程中首尔的一种企业文化，“在股份公司里，掌握了大量股票的人可以随心所欲，这是常识。所以大股东的儿子当社长也是理所应当的事。但是有些人一辈子只能当一个普通社员，有些人充其量只能当个科长、部长，如果不问能力和声望，也不管年龄上的差距，单凭是社长的儿子就当社长，超越了社规，君临一切，这不能不说是资本主义以前的封建主义。如果是好的资本主义，即使利润按股票的多少来分，人事的调配也按照能力和声望来安排。我想我可以臣服于资本主义，但不能臣服于封建主义。况且，我还认为我不能摆出一副臣服于封建主义的卑鄙架势，成为把资本主义引向歧途的那些人的同谋犯。……我不愿意再回去的理由就在于此。不想到任何会社去也因为这个缘故”，对首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里韩民族封

2) 载《南朝鲜小说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p.297.

轉型初期首爾、上海都市小說的一種比較——以《亡命的沼澤》、《告訴勞拉我愛她》為中心 217

建成分的深惡痛絕，使“我”相應地認為，“我的失敗不像拿破侖在滑鐵盧那樣，是由于歷史的因素造成的，而是由于連非扔到垃圾桶里不可的草紙都不如的錢造成的”。“我”察覺首爾資本主義文化的病症，自願逃離這架現代化機器；該個體也許從此被都市社會遺忘，但螺絲釘對機器的拒絕，即映射着現代化體制存在的某種問題。

上海作家唐穎的中篇小說《告訴勞拉我愛她》³⁾展示了都市白領階層的內心遭遇。這是繼《無性伴侶》、《理性之年》後，唐穎又一部關注主人公朋朋的作品，朋朋曾一直處於積極、活躍的工作、生活狀態，那時她的方向很明確；而在这部小說里，她的生活出現危機。市場經濟的發展使上海逐步成為國際化大都市，在其中，朋朋已擁有幾乎所有標志成功的東西：競爭激烈行業里收入不菲的工作，中心市區的套房，比自己更有賺錢能力的丈夫……，用目下最時髦的標準衡量，她便是都市生活浪潮里的弄潮兒。可她遽然醒悟，獲得高級物質享受的代價是沒有自己——體現個體生存意義——的生活，個人生活被現代化機器轉動的節奏弱化乃至吞沒了。她對自己生活狀況的覺悟，一方面來自親身感受；有時滿足一份最卑微的需求，就能使個體生命在茫茫世界中獲得最高貴的心灵享受，自小就迷戀的在秋日夕陽下踩落葉听响聲的樂趣，今天的朋朋竟無從獲得，不僅因為作為螺絲釘被牢牢固定在現代化機器的位置上難得閑暇，而且由于上海加大建設步伐，那些熟悉的行道樹因被砍伐已沒有了落葉；失去精神愉悅的生活，何稱生活？另一方面，朋朋少女時曾暗自愛慕的老鄰居的人生經歷，促使她對生存意義的再發現乃至重新認識，“回上海後，要說到美國有什麼讓我留戀，是我在地鐵拉提琴時的气氛，那股自由自在和着浪漫和傷感，音樂回歸到它最本質的也是最富人性的狀態，我過去坐在樂隊時從未有感受過的。”把更現代化的異域追求個體靈魂自由的價值觀念，驟然移植到尚處於物質主義泛濫環境中的上海人的頭腦里，不啻為一帖洗腦劑。還有，丈夫受同學因心臟病猝死之陰影的籠罩而罹患憂郁症並不時發作，逼迫朋朋猛醒。終於，她以自己的方式反抗現代化體制對個體生存意義的忽略——小說以辭職、外出旅遊作結。有所覺悟却沒有找到新出路的朋朋，生命之舟只是暫時停泊，最終仍需啟航，而怎麼前行，還是未知數。但無論如何，這部小說將上海現代化機器運轉中螺絲釘一定程度的覺醒問題提出來了。

3) 載《小說界》第2期 2001.

三 問題的形成及原由

同为转型初期的创作，首尔都市小说探讨商业体制的弊病，上海小说在为个体生存意义而烦恼。两部作品所提出的现代化体制与个体位置的问题，相应地反映了对两座都市现代化不同角度的观照。一位韩国学者认为：“近代（性）问题，即政治上实现国民国家，经济上完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谓国民国家就是市民性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模式，即由市民阶层形成国家权力中心的政治模式。……如果这种由市民阶层作为主人公创造历史的场面就是近代，那么，将这一历史成为现实的原动力就来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采用及其发展和深化。……近代文学，不知不觉地或多或少地同这种市民阶层的需求及其发展形式和表现形态有关，我们称这一现象为普遍的近代性。”⁴⁾ 该“近代（性）”“就是通常所谓的“现代（性）”，首尔与上海都市文学的差异一定程度在于两座都市市民对物质、精神需求的差别，以及由此表现的现代化起步时间的差异所引起的程度差别。但这是相同方向之下的差别，而非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差别。

自20世纪初，首尔与上海的文学就有这种相似之中的差别。因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民族意识的觉醒，“启蒙”、“救亡”成为两个国家现代文学的主题；从阶级立场揭露资本主义的丑恶，宣传革命，1930年前后韩国的卡普文学和中国的普罗文学都有表现。韩国作家李箕永作于1928年的短篇小说《汉城》（一名《元甫》），写农民元甫服劳役修路被汽车轧断腿，在老伴的陪护下到首尔求医，终因贫穷病死街头的故事。小说以乡下人的眼光观望殖民地资本主义的首尔，首尔人遂成为乡下人的剥削者，这对老夫妻尤其工人罢工领袖“我”，把金钱至上的首尔人际关系对传统美德破坏的失望，以及商业文化对农耕文化摧毁的愤恨，一股脑发泄到所接触的“资本家”——旅店老板娘一身上。

同期的上海左翼文学也有相类的倾向，如丁玲的两个中篇《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之一）、（之二），表现青年知识分子中个人奋斗者与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工作者之

4) 【韩】金允植等著，金香等译：《韩国现代文学史》，民族出版社，2000，p.1.

間的矛盾，通過兩對情侶因上述志向相左而分道揚鑣的經歷，明確了知識分子為启迪工人覺悟而工作的先進性。還有茅盾的《子夜》，把買辦資本家依附國際資本的面目，民族資本家與其競爭的艱辛，產業工人的罷工，農村的暴動等諸種情況動態地展開。“《子夜》不僅是為了揭露金錢罪惡，更在於展示中國特定期期的社會關係，涉及中國社會的出路問題。這是馬列主義指導下的社會剖析小說。”⁵⁾ 以上幾部左翼文學作品再現着70多年前首爾、上海不同的狀況，指出底層民眾、民族資本家等對殖民地現代化的態度及他們在其中的位置。相比之下，上海左翼文學人物刻畫更細膩，事件敘述更翔實。

二戰結束後，獨立自主的中韓兩國人民對資本主義文明的認識更理智，渴望富裕生活成為首要願望，東方民族開始積極追求——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已實現了的——現代化。由於“文明是一元的，是以人類基本需求和全面發展的滿足程度為共同尺度的”⁶⁾，文明沒有國界，既有先進的榜樣，落后的就需模仿。與此同時，東方民族追趕型的現代化過程，也是向強勢文化靠近的過程，傳統的儒家文化之樹因缺乏生長的泥土而不得不日趨枯萎。“在世界一體化的過程中，不同文化系統之間的彼此影響和相互滲透並不總是自願的，更不是等值的。在這一過程中，‘強勢文化’常常居於主導和支配的地位。這種影響和滲透自然有其好的一面，它使得居於弱勢地位的‘弱勢文化’不得不改變其固有的狀態，以提高其文明含量。因此可以說，這種全球化的歷史過程，也正是人類文化不斷提高其內在的文明總量的過程。但是，這種影響和滲透也有其壞的一面，它使得不同民族和地域之間的文化差別越來越小，文化面貌日漸趨同。”⁷⁾ 在首爾、上海主動採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初期，都市小說分別描述了為提高物質文明水平所損耗的本民族傳統文化積累的精神財富及迫使個體改變價值觀念的狀況。

金承鈺的《漢城一九六四年冬》敘述年齡、經歷、生活環境各不相同的三個陌生男人，於一個寒夜在首爾街頭酒棚相遇，一起喝酒、游蕩，以度過無聊夜晚所發生的事情。小說以首爾淒冷的街道為襯托，近乎露天的攤點，被風撕扯的廣告，貌似興旺却滲透着悲感的服務業，安和“我”情願在寒風刺骨的大街上流連而覺得充實，呆在家

5) 黃修己：《中國現代文學發展史》，中國青年出版社，1992，p.330.

6) 陳炎：《“文明”與“文化”》，載《學術月刊》，2002，第2期。

7) 陳炎：《“文明”與“文化”》，載《學術月刊》，2002，第2期。

里却觉得空虚；他们借酒非遣莫名的郁闷，后来一位外表寒酸的中年人自愿加入，且出手大方地请客。原来这个穷汉的妻子患急性脑膜炎死去，他打算连夜把卖妻尸换来的钱挥霍一空，然后自杀。这一切早已安排妥当，但前两位直到最后才恍然大悟，他们却也见怪不怪。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产生商业文化替代传统文化的现象，也就是将后者被认为美好的成分扼杀的现象，个体不得不从各自的角度顺应随现代化而来的异域文化，如小说里自杀的中年人，像“我”这样追求开放生活而患上性病的部队转业人员，还有家境富裕却精神苦闷的大学生安，身份、追求各不相同，对现代化过程中都市的感受则大同小异——“汉城是一切欲望的集结地”。他们宁愿与路人毫无意义地厮混，由交谈到分手，大家一直是生疏的、隔膜的，互不关心却彼此需要，仿佛就为忽明忽暗地交流某种同感，试图从中获得各自生存价值某种程度失却之后的安慰。

与1960年代首尔文学反映的个体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里的体验不同，上海文学直到1990年代才涉及现代化都市横流的物欲对传统观念颠覆的内容。如孙颢的《烟尘》通过主人公方无忌的经历，感受本家亲属对其祖父生前死后态度的转变是以纯粹的一己经济利益为转移的事实；此乃上海人被压抑近半个世纪的金钱观瞬间释放的表现。唐颖的《理性之年》里下岗在家的舒欢的一些传统观念，和身边“与时俱进”的表妹朋朋、丈夫等人的现代都市处事观念存在冲突，且总是她“碰壁”；这里不存在正确与错误的区分，是时代在变，上海正在与国际商业文化接轨，就是说，舒欢自小养成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人生观及中国传统文化理念已不适应于讲求效率的、契约式的、金钱有用的都市文化式样。

这些震动个体灵魂的文化冲突现象，用学者理性的眼光，将其推至广阔的时代背景下观照，却是再正常不过的，“一种民族文化尽管有其自恰的、相对稳定的结构系统，但这一系统并不是先验的、永恒不变的，它本身就是一个既不断建构又不断解构的过程。……以儒家文化为例，那种建立在亲子血缘基础之上的伦理——国家观念是黄河文明及‘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产物，而并不是什么‘恒常不变的道理’。强行改变它是不可能的，永远维护它也是办不到的。它的命运，既取决于外来文化的影响和渗透，更取决于内部土壤的分化和瓦解。随着自然经济的解体和商品生产的发展，儒家文化

轉型初期首爾、上海都市小說的一種比較——以《亡命的沼澤》、《告訴勞拉我愛她》為中心 221

所賴以存在的人與人之間的原始血緣關係正在一點點地被法律契約關係所取代，儒家文化所一貫張揚的倫理道德觀念正在一步步地被公民權利觀念所取代……”⁸⁾就一個國家、民族的整体而言，這種文化轉型無疑是符合社會發展規律的，也是能被歷史地接受的；然而，就个体而言，這種轉型可能是以生存意義的某種被剝喪實現的，某一包含文化觀念的思維習慣的被迫改變，都要經過相應的衝突才能達到心靈的平衡，而有的衝突的完結，還以生命為代價。顯然，首爾的都市小說對个体遭際的悲劇性開掘比上海的更深，悲劇是將人生有意義的東西毀滅給人看，該毀滅是文化轉型的一種代價。首爾的都市小說在文學史上留下了弱勢文化與強勢文化交鋒的印迹，比較而言，上海的都市小說沒有更多地關注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連通之初文化轉型在人們心坎打下的烙印，談不上悲劇還是喜劇，只是輕輕描淡寫而已。

伴隨現代化步伐的深入邁進，通過一個時期的經受、適應乃至改變之後，東方人如何反觀本都市的文化轉型？文學產生了什麼反應？

四 問題透射的反思

《亡命的沼澤》沒有回避內心的真實，意識活動根植於思考深處，將內在的感悟與外在的世界相關聯，嘗試揭露都市人的生存境況，雖談不上對靈魂的拷問，但在大量注重再現現實的當代小說中，它已突顯注重表現自我，表現人之內心的主題，即人活著是為了什麼的問題；在物質文明相當發達的都市，“我”對人生的思考，對現實的關注，對生命的追問，一定意義上超越了所論及的一個領域里一樁具體的事件，將焦點聚集於个体生存的“沼澤”問題。小說是由外部事件引起的，但不像《子夜》將社會動蕩的面貌，激烈的金融競爭，工人反抗的醞釀等場面一一展現，以達到暴露社會矛盾的目的，而主要展現个体靈魂找尋安寧的歷程；儘管沒有跳出局部以宏觀地俯視社會人生，但現代化過程中个体生存的一些游移不定的特征以及飄忽不定的、不可知的涵義

8) 陳炎：《“文明”與“文化”》，載《學術月刊》，2002，第2期。

被揭开面纱的一角。

小说还批判了首尔现代化过程中的一种商业体制弊端。这个巨大的机器是由一组组矛盾的对立与冲突推动的，其中显著的一对矛盾是伴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诞生并日益强烈的市民阶层的权力意识与传统的封建等级观念的抵牾。一个掌握商科专业知识又有一定工作经验的人，只有无条件服从全球商业机器的运转规则及首尔商业领域财阀的权威，才可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同时，这种个体与体制的关系是东方民族现代化社会关系的一个代表，它可以被引申到都市的各行各业。“我”之所以逃离现代化体制，是由于清醒地认识到个人力量对抗现代化机器必定是螳臂当车，为逃避其运转力量的驱使，只有躲进卧室，拿起一本过时的《阿里郎》，从中寻求精神的慰藉；似乎只有成有定们是游离于一切之上的，像河仁立和“我”们在其中很难掌握自己的命运。至此，小说的批判意义强烈地表达出来，谴责首尔现代化体制里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融合的一种形态。如果说《汉城》的批判精神立足于文化保守的立场，那么这里的批判则指向文化保守的现实。

《亡命的沼泽》更深一层的含义在于，作者李炳注着重于发掘都市生活与文学表达的对应关系，尽量指出问题，引起关注，至于提供的答案是否令读者满意却是次要的。在此意义上，这部小说代表了都市文学的某种觉醒，显示了个体思想的活力以及文学参与社会、时代的力量。

《告诉劳拉我爱她》所描述的白领阶层主动离开上海这一中国现代化中心的行为，表明他们目前对都市生活一定程度的拒绝态度；但这种逃离不可能一劳永逸，即使躲到天涯海角，最终仍要面对抉择。就像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里提出——如果没有经济权，出走的娜拉要么堕落，要么回去——的问题；如果不了解处身的现代化都市，不明确自己内心的需求，朋朋仍将难做抉择，是躲进厨房煲汤，还是前往公司上班？即怎样调和都市文化与个体追求间的矛盾，才能使螺丝钉在现代化机器里找到身心皆得安宁的位置。毕竟，这也是一种思考。

五 结语

相较于首尔的都市小说，上海的都市小说还没有涉及反思现代化体制以及展现文学参与社会思潮的能力问题，还有与此关联的其他薄弱环节的问题。当代上海的现代化起步晚首尔近30年，在此期间，国际资本主义的各种运行机制更完备，物质文明更发达，消费文化更成熟，上海在开放门户走商品经济之路的起始，就被这一强劲的潮流征服，表现在物质生活方面，衣食住行样样概莫能外，仅以饮食为例，吃麦当劳、肯德基、必胜客……，才算都市人，仿佛现代化就是把西方尤其美国的物质生活样式一五一十地搬进来。当代文化潮流不知不觉被这样形成。一时间，都市文学来不及观望，就被大众文化的飓风携带着，没有机会喘息，更不要说驻足思考，或者试图招架。

但渐渐地，文学艺术恢复了其“高于生活”的姿态，上海都市小说开始回过神来，谨慎地躲避流行文化的劲力，试图找回文学的灵魂；多元化地叙述都市人的生活即是一种尝试，如王安忆在《我爱比尔》等作之后以底层民众为主人公的作品。关注新一代工人阶层的生活、情感，这一现象与1980年代韩国文学的一股“民众文学论”⁹⁾潮流有某种相似之处，这是当代文学的重要现象；底层民众的生存状况属于现代化的一部分，也是都市文化的一道风景线。不过，第三人称的叙事，与《亡命的沼澤》第一人称叙事相比，似乎隔了一层薄膜；全知视角能观照开阔的范围，反映宏大的场景，却难以进入人物的内心深处，那么，工人阶层对现代化的感受就难以得到充分展示。

季羨林先生在谈论中西文化互补问题时认为，“文化可以包括人的一切生活方式和为满足这些方式所创造的事事物物，以及基于这些方式所形成的心理行为，它包括着物的部分，心、物结合的部分和心的部分。我们要拿来的是属于心的东西。……所谓‘心’的东西，指的是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趣味、道德情操、宗教情绪、民族性格等等。”¹⁰⁾流行文化反映的多是有关物质的部分，而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另一个重要的关涉人的灵魂的领域，是不容易看得见摸得着的，如西方人对神的信仰，对宗教

9) 【韩】金允植等著，金香等译：《韩国现代文学史》，民族出版社，2000，p.473.

10) 蔡德贵：《季羨林先生的“东西文化互补论”》，《新华文摘》第10期 2001.

禁地的敬畏，即是约束其言行的内心尺度，也是净化、升华灵魂的必要途径。当物质主义的文化风暴遮迷了大众的眼睛，学者冷静地提醒，现代化更重要的是人“心”的归属问题，我们不能把“心”挂在物质之树梢，任凭冷风、热风吹刮。文学作为艺术高于大众潮流，一定程度在于以强势文化“心”的部分为参照；都市是人市，都市的灵魂是文化，人的精神反映都市的文化面貌。

与具有漫长历史的乡土文化相比，都市文化是中国的新生事物，都市文学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占据较小的份额，现代的新感觉派、张爱玲等的海派小说，当代的反映弄堂文化的市井小说，都有一定的成就；而真正属于金允植所谓的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配合的有“市民性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模式”意识的都市文学才慢慢走上正轨。乡土文学在现当代的演变，正在于历史恒常因素的比照，每当现代化的阵风吹拂村镇，文学即可以将其变迁表达出来；比较而言，都市生活不仅是新兴的，且一直处于变更中，反倒难于提纲挈领地描述。同时，我们才开始都市文化的积累，都市文学还没有可依据的本民族的衡量标准，中国当代文学因此历史地承担着这一奠基任务。在这片待垦殖的土地上，作家可以从不同角度施展才能；鲁迅说，“盖诗人者，撷人心者也”，聚焦人的灵魂，方能产生“撷人心”的作品。

《參考文獻》

- 【韓】金允植等著，金香等譯：《韓國現代文學史》，民族出版社，2000。
黃修己：《中國現代文學發展史》，中國青年出版社，1992。

《Abstract》

The modernized course of oriental people is to catch up with other nationalities, it also is a process of accepting the advantageous culture, the commercial culture substituting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which makes the two contradictory as well as integrating. In respect to the individual, the

轉型初期首爾、上海都市小說的一種比較——以《亡命的沼澤》、《告訴勞拉我愛她》為中心 225
process is realized by a certain kind of loss of the meaning of existence which manifested in Seoul's urban novels in the history of literature. The beginning of modernization in Shanghai is nearly 30 years later than that in Seoul, the urban culture's accumulation just starts without any reliable criterion. Therefore, Chines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historically undertakes the task of laying a solid foundation of urban literature.

Keywords : Seoul, Shanghai, The urban novel, The modernization; Individual position

이 논문은 2008년 11월 22일에 접수되어 2008년 12월 7일에 심사가 완료되고
2008년 12월 15일 편집회의에서 게재가 확정되었음.